

# 山西霍窑相关问题探讨

□ 宋国栋

霍窑位于山西霍州市白龙镇陈村,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重要瓷窑之一。1975年,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在临汾地区文化局的协助下调查了该窑址,并为之认定为元代霍州窑址,此后,一些学者根据调查资料对霍窑遗址的烧造情况进行了介绍<sup>[1]</sup>,霍窑逐渐受到古陶瓷研究者的关注。

与其他古代名窑相比,霍窑没有显赫的名声,在有关霍窑的古代文献记载中难见赞誉之词。我国古陶瓷研究者对霍窑瓷器进行评述时,也明显地受到古文献作者态度的影响,以至于产生了一些不够中肯的认识。鉴于此,本文对霍窑的产品特点和制瓷成就等若干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恳请同仁指正。

## 一、对文献记载的辨识

我国明清文献中对霍窑的记述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寥寥数语,非常简单。

曹昭《格古要论》卷之七《古窑器论》中《霍器》条中载“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彭窑》条中载“元朝钱金匠彭均宝,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甚整齐,故名曰彭窑”。土脉细白者,与定相似,比青口欠滋润,极脆,不甚直钱。卖骨董者称为新定器,好事者以重价收之,尤为可观”。

高濂《燕闲清赏笺·论定窑》中载:“元时彭君宝烧于霍州者名曰霍窑,又曰彭窑,效古定折腰制作甚工,土骨细白,凡口皆滑,惟欠润泽,且质极脆,不堪真赏,往往为牙行指作定器,得索高资可发一晒。”

朱琰《陶说》卷二《古窑考》中载:“又有元朝彭均宝者,效定器作折腰样者甚整齐,曰彭窑,时称之为新定。”

另外,《留青日札》《文房肆考》《博物要览》、《景德镇陶录》《窑器说》以及撰写较晚的《瓷录》、《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瓷器概说》《瓷史》《磁论》等书对霍州窑也有记载,在描述上大同小异,此

不赘述。这些记载是我国古陶瓷研究者经常分析和利用的资料,由此在归纳霍窑瓷器特点时,受其影响,“仿定、质脆”也成为其重要标志。文献记载中所蕴含信息的积极意义当然不容置疑,但也需要仔细思考,更进一步地探求真相。下面就文献中涉及到的问题谈一些笔者的认识。

1.对于“霍窑”和“彭窑”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有三种认识:第一种观点赞同文献所述“彭窑”即是“霍窑”,这也是当前学术界最流行的观点。《中国陶瓷史》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并认为“彭窑”是以人得名,霍窑是以地名得名,彭窑实际上就是霍窑<sup>[2]</sup>。第二种观点以叶佩兰女士为代表,认为“彭均宝所仿定器应该是霍窑中的一个品种,彭窑实际上不等于霍窑”<sup>[3]</sup>。第三种观点认为彭窑是霍窑的一个窑口<sup>[4]</sup>。

“彭窑”因人得名和“霍窑”因地得名是毋庸置疑的。自金代开始,“霍州”作为地理区划名称延续至今<sup>[5]</sup>,而霍窑的烧造历史也恰好始于金代,结束于明代。作为指代一个烧造历史悠久的窑场的名称,“霍窑”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上则更具优越性。“彭窑”一词则具有特定的阶段性,仅仅是元代彭均宝“效古定器”时霍窑的代称,如果将金代或明代霍窑瓷器称作是彭窑瓷器似乎有些牵强。因此,“彭窑”应视作是“霍窑”整个发展历史中一定时期内“效古定器”时的称谓。

2.彭均宝“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是否说明彭窑为仿定窑场并应纳入定窑体系?目前有许多种观点,持肯定态度的较为多见。《中国古陶瓷图典》介绍霍窑时称“金、元之际以仿定窑为主”<sup>[6]</sup>,并将霍窑看作是定窑系的主要窑口之一<sup>[7]</sup>。持否定态度的以水既生先生为代表,他认为霍窑没有仿定窑,是在自己技艺基础上的延续与发展<sup>[8]</sup>,霍窑元代以前的白瓷,就有很高的水平<sup>[9]</sup>。陶富海先生则认为霍窑和同时期的鹤壁窑存在某种交流关系<sup>[10]</sup>。

窑场之间是否存在仿烧,应该从烧造方法、造型、装饰等方面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而不应简单的以“形似”判断。然而这些因素却往往被古陶瓷研究者所忽略,以至于经常见到将一些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窑场附属到一个名气较响亮的窑场上,并形成所谓的“窑系”,这种攀附的习惯对古陶瓷的深入研究极为不利。霍窑是否效仿定窑,也应从这些方面探讨和研究。从烧造工艺上看,金元时期霍窑叠烧、小支钉支烧与定窑北宋后期以后流行的覆烧工艺完全不同。在造型方面,除了折腰盘以外,其他样式的瓷器难以看出霍窑有仿定窑痕迹,霍窑金元时期流行的小碗、盘以及元代流行的高足杯与定窑产品毫无相似之处。北宋时期,景德镇等南方地区窑场也生产折腰盘,如江西婺源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汪路墓、婺源靖康二年(1127年)汪路妻张氏墓出土有青白瓷折腰盘<sup>[10]</sup>。北宋后期至金代,定窑生产多种样式的瓷盘,折腰盘只是其种类之一,并非盘类的主流产品。另外,金元时期的钧窑也生产同类产品,如故宫博物院藏有的1件此式瓷盘<sup>[11]</sup>。所以,折腰盘的器形是否最早出现于定窑,霍窑折腰盘是自己创烧还是模仿某一个窑口,这些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解决。在图案装饰方面,霍窑以素面为主,凡是带有图案的瓷器全部是印花工艺,而定窑瓷器存在着印花和刻花两种工艺,纹饰也较霍窑瓷器清晰,纹饰题材的选择和图案的布局方面上也存在着许多差别。在施釉技术方面,定窑瓷器除口缘和足缘处无釉外,其余部位施全釉,而大部分霍窑瓷器的足底则露着胎,甚至在瓷器外壁施半截釉。而到了明代,霍窑生产白地黑花瓷器,和定窑瓷器更没有类同性。因此,霍窑与定窑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技术交流,以特定历史时期内个别产品外观的“形似”而认为霍窑仿定以及属于定窑体系是不科学的。

至于彭均宝《效古定器作折腰样》的记载,笔者更倾向于是营销策略的产物,可能是彭均宝等霍窑生产者的广告宣传,借定窑之名气来抬升霍窑产品的地位。

无独有偶,熊海堂先生在《东亚窑业技术与交流史研究》一书中介绍了一个非常相近的例子,高丽青瓷大量模仿中国北方民窑的造型与装饰,宋代徐克在《高丽图经》中写道高丽青瓷“类定(窑)”一类的文字,因此造成高丽青瓷曾接受过中国北方制瓷技术影响的错误判断。通过窑炉、窑具、燃

料等方面的分析,结果显示朝鲜半岛与中国南方在技术层面上具有直接的联系,而与外观比较所得的结论完全不同<sup>[12]</sup>。

3.胎壁薄是导致霍窑质脆的直接原因。在前述明清文献中,可以见到对霍窑瓷器“极脆”的记载。同样《中国陶瓷史》介绍霍窑时称“霍器极脆,用手能把瓷片折断,那是由于胎中含铝( $Al_2O_3$ )量高,温度尚嫌不足的缘故”,难以久传<sup>[13]</sup>。这种对质脆的过分强调,一方面容易忽略其成因,另一方面容易形成霍窑瓷器质量低劣的假象。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瓷胎一般属高铝质胎<sup>[14]</sup>,所以胎中含铝量高是北方地区许多窑场产品的共性,并非霍窑所独有。金元时期,霍窑胎质之所以显脆,可能与高铝质胎和烧成温度有关系,但其主要原因就是胎壁太薄,有的甚至薄可透光。除了一些制作极薄的瓷器口沿外,笔者没有发现霍窑瓷器酥脆到可以用手折断的程度,特别是瓷器的底部,非常结实。霍窑瓷器拥有着广阔的北方市场,质地酥脆的瓷器并不可能经过长途颠簸抵达北方草原地区,也不可能为当地的民众所青睐。而在元代的北方地区,其他窑场难以生产出此类薄胎瓷器,如果其他窑场也将其产品制作成类似薄度,恐怕也同样显脆。明代的霍窑所生产的白地黑花产品将瓷胎加厚,其坚实度也大幅度增强,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其他北方窑场产品。因此,在总结金元时期霍窑瓷器的特点时不应该过分强调质脆,而应该注意到其胎体薄且轻的特点。

## 二、霍窑瓷器特点

霍窑的延用时间比较长,历经金、元、明三代,霍窑产品的技术工艺和特征也是在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变化。过去由于霍窑产品的考古学材料较少,严重地妨碍了人们对其详细面貌的认识。在一些学者的论著和文章中,也常常出现将各个时代的产品混淆在一起的情况。鉴于此,笔者结合其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以及众多前辈的研究成果,将霍窑瓷器的特点按时代总结介绍如下:

霍窑在金元时期主要生产白胎瓷,胎土细白、胎壁薄是此窑的重要特点,这种薄胎技术不适宜于生产形体较大的产品,所以该时期的霍窑产品都显得秀巧轻灵。霍窑白釉瓷器的口部都施釉,不同于定窑的“芒口”,正如明人高廉在《燕闲清赏笺》中提到的霍州窑瓷器“凡口皆滑”。霍窑瓷器轻灵的胎壁还使其所用支钉的体积非常小巧,端头比较尖,在器皿

内留下的支钉痕非常小,如米粒状。

金代的霍窑瓷器烧造方式以砂圈叠烧为主,小支钉支烧方式较少使用,叠烧而成的器物内底刮釉一圈(涩圈)。瓷器釉色呈白色,较为透亮,但不稳定,部分瓷器釉色略偏青黄,釉厚处泛青,器物的足底露胎,部分瓷器的外壁施半截釉,施釉前上白色化妆土。器形有碗、洗、盖罐等。小碗是金代霍窑最常见的产品,形体较小,口径10厘米左右,或为素面,或印六条分布均匀的竖凸直线,或在内壁印饰花叶纹、水涛纹、蔓草纹、海马纹等图案,内底中央饰团花纹饰,水涛纹以多重弧线线条构成。这些纹饰的线条非常细腻,在其他瓷窑中比较少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一件带纪年款识的霍窑碗,内壁印花,外壁施半截釉,露胎处墨书“明昌四年柒月初四三季置到”<sup>[15]</sup>,这是金代晚期的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霍窑瓷器。山西博物院的藏品中有一件霍窑白釉盖罐<sup>[16]</sup>,罐肩刻一周卷草纹,是金代霍窑所制作的一件比较精细的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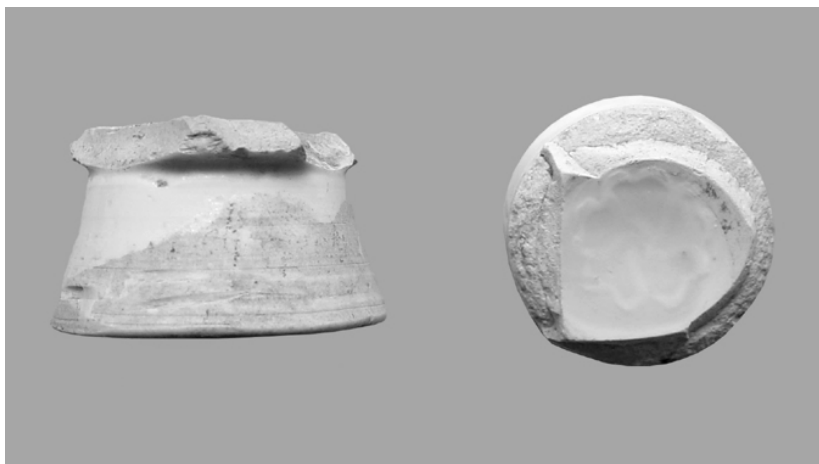
元代霍窑瓷器的烧造方式基本不见砂圈叠烧,以小支钉支烧为主,在器物内底留有3~5个米粒状大小的支钉痕,最常见的是5个,一些残留在器足的支钉呈三角状。釉色比较稳定,颜色白且透亮。大部分瓷器的外壁露胎处都有旋刷痕,足底露胎,圈足较小,挖足过肩,圈足足壁向外斜侈,略呈喇叭状,一些瓷器的圈足足缘斜切。大部分瓷器的表面无任何装饰,少量瓷器在内底装饰印花图案,有的图案中央模糊,边缘清晰。元代霍窑瓷器的器形有折沿盘、侈口弧腹盘、侈口浅腹盘、侈口折腹盘、碗、高足杯等。碗的形体较小,无任何装饰。高足杯以足柄与杯身相粘接而制成,形制种类较多,大小不一,口部主要分为侈口和撇口两种,足为喇叭形足。根据足部具体特征又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无任何装饰,第二种呈竹节形,第三种有斜竖的条形纹。绝大部分高足杯都无任何装饰,足柄内无釉。此外,还有一种杯的杯身与高足杯相同,但足柄比较低矮,属于高足杯的一个变种。折沿盘的下腹平折,有的折沿盘将腹部压制成花瓣状,盘内印有花叶纹,有的折腹盘的腹部较深,器形介于盘、碗之间。

折腹盘在内蒙古地区仅发现于包头燕家梁遗址元代晚期的窖藏当中<sup>[17]</sup>,而在该遗址的元代早中期地层中却没有发现这类瓷器。如果这类型折腹盘即是彭均宝所烧造的“效古定”折腰样式,彭均宝创烧“仿定”烧制“折腰样式”时间也很可能是在元代晚期。

明代霍窑的产品风格较之金元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胎壁加厚,胎土也不及金元时期细白,甚至泛浅灰色。在烧造方式上仍然以支烧为主,但支钉变大,留在器物内底和足底的支钉痕也相应变大。除了白釉以外,有的瓷器釉色泛青或泛黄,足底一般露胎。器形有碗、盘、高足杯、罐、瓶等,碗、盘、高足杯的下腹部斜折,转折处的内壁有一圈凸起的楞线。开始使用釉下黑花装饰,图案风格多样,有松鹤、花鸟、麒麟、螺旋状缠枝花卉、文字铭文等。罐的造型口大底小,丰肩鼓腹,下腹敛收,圈足外撇,肩部绘螺旋状的缠枝花卉,腹部绘缠枝花卉或树木花草<sup>[18]</sup>。

### 三、生产与销售

霍窑虽然没有从定窑汲取烧造工艺,却与周围窑场有着比较频繁的技术交流,是在和周边窑场交流以及自身创新的情况下不断发展的。霍窑与介休窑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在技术层面上也存在着近缘关系。介休窑基本上是一个沿着自己的生产轨迹不断发展的窑场,其烧造方法是匣钵垒装套烧工艺,即将盘、碗等圆形器类制品在一件匣钵中垒装2~4件,在底足上粘接3~5个小支钉,烧成后,碗、盘内留有很小的支钉痕<sup>[19]</sup>,这与霍窑的烧造方法非常相似。霍窑烧造白瓷的测试窑温工具与介休窑相同,为环状测试具<sup>[20]</sup>。由于介休窑的烧造历史较早,



图一 内蒙古额济纳旗元代亦集乃路故城出土的霍窑白瓷标本





图二 蒙古国元代和宁路故城遗址内的霍窑白瓷标本

霍窑作为后起窑场,很可能借鉴了介休窑的烧造技术,并在烧造实践过程中将这一技术传承和发扬。

金元时期,霍窑瓷器有着广阔的北方市场。笔者曾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元代集宁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该城始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该城的金代晚期地层中就发现了一些霍窑瓷器<sup>[21]</sup>。这表明至迟在金章宗明昌年间,霍窑瓷器已经进入了内蒙古地区的贸易市场。但是在元代集宁故城遗址的元代初期地层中,却很少发现霍窑瓷器,这可能是受金末战争的影响而使销售渠道出现中断。金、元的军队在霍州地区发生了数次战役<sup>[22]</sup>,霍窑在此期间可能间断地烧造,甚至出现停产。到了元代后期,霍窑瓷器除了在山西一带销售外,积极向各地拓展市场,河北磁县的南开河沉船曾发现两件霍窑白釉高足杯<sup>[23]</sup>,杭州市的元代瓷器窖藏中也发现有霍窑托盘和柄杯<sup>[24]</sup>,另外,霍窑瓷器也重新进入广阔的北方市场。元大都<sup>[25]</sup>、元集宁路故城<sup>[26]</sup>、包头市燕家梁遗址<sup>[27]</sup>、元代亦集乃路故城<sup>[28]</sup>也发现了许多霍窑瓷器(图一),这个区域涉及到从现今北京地区到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地区之间的广阔的农牧结合区域。笔者对蒙古国元代和宁路故城遗址进行调查时<sup>[29]</sup>,在城内的地表上也发现了许多霍窑瓷器碎片,主要为高足杯、小碗、盘的残片(图二),由此看来,霍窑瓷器曾经被转运到蒙古国漠北地区,其营销范围有可能通过和宁路故城向更为广阔的北方地带扩展。但是,同其他窑场的瓷器相比,霍窑在各个遗址出土瓷器总量上所占的份额比较小,这反

映了霍窑在元代的生规模并不是很大。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不甚值钱”的记载并不能反映元代霍窑瓷器当时的市场价值。霍窑瓷器不仅发现于元代集宁路故城遗址、包头市燕家梁遗址、杭州市的元代窖藏中,同时还发现于规格较高的元大都后英房居住遗址内<sup>[30]</sup>,这表明霍窑白瓷在元代有别于普通日用粗瓷,是深受民众珍爱的瓷器品种之一,其精细的工艺,也在上流阶层受到欢迎。

元代的霍窑瓷器之所以会扩展到广阔的北方市场,其原因主要有四方面:第一,北方制瓷业整体出现衰落趋势,大部分窑场所产瓷器以日用粗瓷为主,白釉瓷器胎厚而釉色泛青黄,很难见到质地细腻、釉色白净的瓷器,而霍窑白瓷则以其上乘的质量成为白瓷的佼佼者。第二,彭君宝“效古定器制折腰样”使霍窑瓷器名声大噪,为霍窑瓷器带来了非凡的广告效应。第三,元代发达的驿站制度促进了商品物资的流通,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霍州站马五十四匹”<sup>[31]</sup>,霍州驿站是当时冀宁(太原)至平阳(临汾)之间的重要驿站之一。第四,元代的牙行为商品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甚至有专门的“磁器”牙行<sup>[32]</sup>。

到了明代,霍窑虽然极力改进产品,转变风格,但是仍旧与北方地区的其他窑场一样,市场竞争力较弱,这主要是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影响。第一,明王朝以长城为界进行统治,使包括霍窑在内的北方窑场丧失了北方广阔的贸易空间。第二,南方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制瓷业的异军突起,其产品基本上垄断了全国各地的市场。景德镇青花瓷、釉上彩瓷、颜色釉瓷等多种类型的瓷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给北方制瓷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山西洪洞、临汾、浮山、垣曲等地出土霍窑白地黑花瓷器的情况来看,明代霍窑瓷器的行销范围可能主要在霍州以南的山西南部地区<sup>[33]</sup>,仅作为普通民用瓷器使用。

同其他窑场相比,霍窑瓷器的风格独树一帜。霍窑白瓷的造型秀雅灵巧,在胎壁厚度和支钉的运用方面达到了极致化,成为中国古代白瓷中的一个特殊类型。秦大树教授认为“霍州窑成为元代时北方地区生产最精细的瓷器产地”<sup>[34]</sup>,这是迄今为止对

霍窑制瓷成就最为中肯而又恰如其分的评价。

[1] 光军 山西霍县发现重要瓷窑》《文物》1980年第2期；陶富海《山西霍州市陈村瓷窑址的调查》《考古》1992年第6期。

[2]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3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3] [15] 叶佩兰著《元代瓷器》第203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

[4] 刘秋平《霍州窑及其白釉瓷器》《文物世界》2003年第6期。

[5] 宋廉等《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一《志·第十七·地理二》，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六十八《志·三十五·地理七》中，记载了历代霍州的行政区划。

[6]《中国古陶瓷图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陶瓷图典》第308页 霍窑”条，文物出版社，1998年。

[7]《中国古陶瓷图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陶瓷图典》第285页 定窑系”词条，文物出版社，1998年。叶佩兰女士认为“元代霍窑主要烧制白瓷，仿定瓷及少量的白地黑褐花瓷”，见其所著《元代瓷器》第203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

[8] 水既生《山西陶瓷考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9] 同[1]陶富海文。

[10] 彭适凡《宋元纪年青白瓷》图35、38，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年。

[11]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上）》，图227，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

[12] 熊海堂著《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第19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3]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3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14] 张福康《中国古陶瓷的科学》第2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16] 山西博物院编《山西博物院珍藏》18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17][27] 塔拉、张海斌、张红星《水旱码头燕家梁》，《文物天地》2007年2期。原文中为“霍窑折腹碗”，据笔者了解，此器出土于元代晚期窖藏之中。

[18] 郭学鑫《明代磁州窑瓷器》第11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19] 蔡毅《宋金北方白瓷的比较学研究》《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1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20] 同[12]，见该书第10页。

[21] 陈永志主编《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第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该书中没有介绍霍窑瓷器出土地层，但笔者曾参加过此遗址的发掘，比较了解遗物和地层堆积之间的对应情况。图九中带涩圈的白釉碗即是金代晚期霍窑瓷器。

[22] 脱脱《金史》卷一百二十二《列传·第六十·忠义二》中介绍贾邦献和移刺阿里合的事迹时，提到了发生在霍州一带的战事。

[23]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3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亦见河北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元代木船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6期，此报告将木船的倾覆时间上限定为至正十二年，即1352年。

[24] 桑坚信《杭州市发现元代窖藏》《文物》1989年11期。

[25]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3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26] 陈永志《发掘集宁路元代城址及第三批窖藏》，《文物天地》2004年3期。亦见陈永志主编《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第163页图版117、164页图版118，文物出版社，2004年。

[2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年7期。此报告中对出土遗物介绍的比较简略，没有涉及到霍窑瓷器标本，但笔者在此次发掘出土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些霍窑瓷器标本。

[29] 位于蒙古国前杭爱省哈喇和林苏木，蒙古时期都城，最后易名为和宁路总管府。

[30] 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6期。原报告中没有明确指出霍窑瓷器，但叶佩兰女士认为其中有霍窑瓷器，见叶佩兰著《元代瓷器》第205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

[31]《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四百二十二，站赤二，中华书局，1986年。

[32] 宋廉等《元史》卷二百五《列传第九十二·奸臣》中记载，卢世荣“罢白酵课，立野面、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

[33] 同[18]，见该书125页。

[34] 秦大树著《宋元明考古》28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作者工作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